

DOI: 10.15896/j.xjtuskxb.201501001

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 ——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边燕杰,肖阳

(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农村大学生是当前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采取群体比较的视角,研究农村大学生和其他相关群体的职业生涯机遇及其影响要素。CGSS2010 数据分析表明:(1)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拥有相同的机会进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拥有同样机会获得精英职业地位,经济收入水平不相上下;(2)即使获得了大学文凭,如果没有实现农转非,农村户籍身份也会降低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单位地位、职业地位、收入水平都比城市大学生低;(3)在非大学生群体中,农转非也将提升农村背景的城市劳动力的上述职业生涯机遇。文章性地提出当前城市劳动力存在六大社会群体的观点,通过实证分析,理清了户籍身份和高等教育对于职业生涯机遇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关键词] 出生地;户籍身份;单位类型;职业类别;经济收入;CGSS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5)01-0001-07

农村大学生是我国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户籍制度的社会分层后果、检验高等教育的有效性的关键群体。如果由于户籍制度的结构制约,农村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城市中求职难,不得不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工作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大学生,那么,这不但表明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户籍身份歧视,而且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人为地贬低了人力资本的产能价值,严重浪费了可贵的高等教育投资。反过来,如果农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机遇等同于城市大学生,户籍身份歧视只存在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进城农民工群体中,那么,这不但表明高等教育资源没有被浪费,而且表明大学学位是农村青年抛离户籍身份歧视的关键社会标示。两种结果的政策意义截然相对,都十分重要。社会现实如何呢?

本文从关注农村大学生出发,在群体比较的视角下,借助《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数据回答这一问题。通过研究可知,影响人们职业生涯机遇的直接要素有三。第一,出生地是城市社区还是农村社区?第二,户籍身份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第三,获得了高等教育还是尚未获得高等教育?这样,我们

就可以将城市现有劳动力划分为六大社会群体。前三个群体接受了高等教育,即(1)来自城市的大学生、(2)来自农村但经历了“农转非”的大学生、(3)来自农村但没有经历“农转非”的大学生;后三个群体尚未接受高等教育,包括(4)来自城市的非大学生、(5)来自农村但经历了“农转非”的非大学生、(6)来自农村但没有经历“农转非”的非大学生(这个群体是通俗意义上的“农民工”)。为了简化表达,我们上述六大群体分别称之为城市大学生、农转非大学生、未转非大学生、一般城市劳动力、农转非劳动力、进城农民工。

基于CGSS数据,建立统计分析模型,比较六大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农转非机会、就业机遇、收入水平的群体差异。在提出研究设计之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已有的研究。

一、已有研究与未尽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建立一套全新的户籍制度来管理人口^[1]。研究表明,这套户籍制度发挥着四种功能:收集和管理住户人口信息、为资源配置提供数据基础、控制国内人口迁移、管理特殊群体^[2]。户

[收稿日期] 2014-06-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77)

[作者简介] 边燕杰(1955-),男,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籍制度最为显著的社会分化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按户籍身份不平等地配置社会资源,城市居民大大优于农村居民;二是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从而固化了城乡居民的不平等。1978年之后,我国逐渐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开始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非农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涌入城市,成为城镇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3]。

但是,户籍制度本身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只有少部分人可以通过政策规定的途径(例如招工、升学、参军等)将农村户口转化为城市户口,即通常意义上的“农转非”,获得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制度资源^[4],所以导致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现象:他们的户口在农村居住地,虽然驻足城市生活和工作。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9%。这些被称之为农民工的人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普遍缺乏城市居民的权益^[5],在工作性质、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方面受到了种种歧视^{[6][7][8]}。研究者的关注点通常是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9]数据显示,2011年城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3483元,而农民工只有2049元,相当于城市职工的59%。在解释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的诸多理论中,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占据主流地位。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工作经验等能力资质对收入的提升作用^[10]。李培林、李炜^[11]认为,人力资本是城市外来人口工资收入低的主要制约因素。邢春冰^[12]利用2005年数据发现,外来人口的平均小时收入仅为本地居民的64%,其中90%的收入差别是由劳动者特征的差异造成的,教育水平的差异首当其冲。德姆希尔等人^[13]的研究也指出,农村移民在年龄、工作经验、教育水平方面均低于城市职工;他们认为,农村移民的“市场准入禀赋”(pre-market endowments)太低,其实指的就是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太低。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了另一个研究视角。持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认为,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是按照人们的户籍身份而分割的^[14],其根本社会属性是歧视农民工:即使拥有同样的人力资本禀赋,农民工的收入还是大大低于城市职工。王美艳^[15]运用Oaxaca^[16]工资差异分解模型,对农村工的收入歧视做了计量分析。她首先区分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两个群体,然后按照一系列个人特征分别计算每个群体的工资水平,最后累加计算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发现76%的工资差异可以用户籍歧视来解释。谢桂华^[17]、

邓曲恒^[18]等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

在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框架下,现有的实证研究均关注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两个群体的对比,但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现行户籍制度下,一部分出生在农村的个体已经通过政策规定的招工、升学、参军等渠道,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正在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将迅速加大这一群体的规模。那么,对于户籍歧视问题的研究,就不能简单地通过考察现有户籍身份来完成,而必须同时考虑人们的出生地和是否经历了农转非。范芝芬^[19]研究了这一问题,她的广州调查数据显示,与城市居民相比,农转非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反而更具优势,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遇也更好一些。这与一项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20]。对于这种耐人寻味的实证发现,研究者通常归咎于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农村中只有少数一部分人实现了农转非,而这些人是通过“极度正向选择”筛选出来的人,是农村精英中的精英,不能代表农村人的主体。这就是在研究者中形成共识的“选择性假设”。

虽然“选择性假设”揭示了群体比较的复杂性,提出了群体内部差异性的问题和解释视角,但在分析户籍制度的社会分层后果方面依然有失正确性,理由有三。第一,成功实现农转非的群体,约一半是通过高等教育的途径获得城市户籍的,并在职业生涯经历和地位指标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21]。那么,促使这一飞跃的要素,究竟是农转非的户籍身份变化,还是高等教育所表现的优秀资质?现有研究没有给出回答。第二,设定高等教育资质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实证分析就必须将大学生群体独立划分出来,在这个群体中比较农村背景和城市背景的差异,而现有研究没有提供这个比较。第三,设定户籍身份是众多关键影响要素之一,而在户籍改革的条件下,2002年以后大中专学生可以选择保留农村户籍,所以,尚未实现农转非的农村大学生,就成为检验是否存在户籍身份歧视的关键群体,与实现了农转非的农村大学生进行比较。但是现有研究也没有提供这一比较。

为了解决上述未完成的研究议题,有必要将城市现有劳动力划分为六大社会群体,如本文开始的概括。我们坚信,六大劳动力群体的划分,不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分析户籍制度对职业生涯机遇的影响,也将帮助我们明确判断高等教育对于可能的户籍身份歧视的弱化、驱除、否定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不但显示知识的力量,同时表明户籍身份歧视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确定的社会性边界。

二、数据、变量和方法

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年CGSS。该调查采用四段概率抽样,各段抽样单位分别是区/县、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居民住户。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调查时从事非农劳动的在职者。考虑到大学生群体是本文分析的重要比较群体,我们将研究对象限定在21-65岁之间。假定研究对象6岁上小学,18岁高中毕业后上大学,21岁大专毕业开始工作,22岁大学本科毕业开始工作。使用这些假定虽然出现一定的估计偏差,但符合大学生主体。

因变量。本研究考察人们的职业生涯机遇,用三个因变量来测量:单位类型、职业类别、经济收入。单位类型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集体企业(包括集体控股)、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个体户)。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职业类别考虑了管理精英、专业精英、非精英三种。CGSS2010使用“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记录被访者的职业类型^[22],本文将其转化为上述三类。仿照谢桂华^[23]提出的方法,管理精英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及办事人员中有管理权力的人;专业精英是指专业技术人员;非精英是指非管理类、非技术类的职业,包括一般的办事人员、商业服务

业人员、农林牧副渔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其他体力劳动者。最后,经济收入是被访者2009年全年的总收入。考虑到收入的非正态分布,在统计模型中我们对其做了对数化转换,使其满足正态分布的统计分析条件。这一方法普遍应用于收入模型分析。

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被访者的身份类别,这一变量是依据被访者出生时的户口性质、目前的户口性质、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三个变量生成的。基于本文的研究框架,将被访者的身份类别分为六类:(1)城市大学生、(2)农转非大学生、(3)未转非大学生、(4)一般城市劳动力、(5)农转非劳动力、(6)进城农民工。在分析中,我们以城市大学生为参照群体。

控制变量。除了性别和年龄之外,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家庭背景通常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受限于数据,本文使用被访者14岁时的家庭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问卷中要求被访者回答14岁时家庭所处的社会层次,十个层次,10分代表最高,1代表最低。

表1按照六大群体给出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显示群体差异的检验值。表1显示,我国城市劳动力六大群体之间,在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单位性质、职业类别、收入水平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六大群体划分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具体看六大群体在三个因变量指标上的差异。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差异性检验

变量	城市大学生	农转非大学生	未转非大学生	一般城市劳动力	农转非劳动力	进城农民工	卡方值/F值
男性比例	52.39%	63.68%	54.79%	61.7%	53.14%	62.84%	34.74***
平均年龄	36.45	36.79	30.96	43.72	42.33	39.61	69.88***
家庭经济地位	4.34	3.41	3.73	3.58	3.25	2.85	57.30***
单位性质(列%)							751.48***
党政机关	10.52%	15.19%	5.63%	4.65%	4.98%	0.94%	
国有企业	45.41%	48.75%	15.49%	29.72%	20.64%	7.34%	
集体企业	6.51%	7.03%	11.27%	7.36%	8.01%	5.12%	
私营企业	37.56%	29.03%	67.61%	58.27%	66.37%	86.6%	
职业类别(列%)							1.2E+03***
管理精英	21.58%	20.63%	27.4%	10.3%	13.37%	7.87%	
专业精英	45.63%	55.61%	23.29%	10.15%	9.9%	4.78%	
非精英	32.79%	23.76%	49.31%	79.55%	76.73%	87.35%	
平均收入	56616	61009	43061	24221	26715	20236	14.02***
对数平均收入	10.34	10.40	9.55	9.50	9.39	9.34	56.26***
样本量	607	446	73	825	606	1359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一是单位性质。进入党政机关,比例最高的是农转非大学生,为 15.19%,其次是城市大学生,10.52%;进入国有企业,比例最高的依然是农转非大学生(48.75%),其次是城市大学生 45.41%。如果农转非大学生是“极度正向选择”筛选出来的^[24],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么在城乡教育机会极度不平等的情况下^[25],未转非大学生也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可是后者却没有同样的机遇进入党政机关(15.49%)和国有企业(5.63%),而是集中在私营企业(67.61%)。在三种非大学生群体中,处于最劣势的是进城农民工。

二是职业类别。进入管理精英,城市大学生的比例为 21.58%,农转非大学生(20.63%)很接近。进入专业精英,农转非大学生的比例(55.61%)高出城市大学生(45.63%)将近 10 个百分点。未转非大学生进入管理和专业精英的比例分别为 27.4% 和 23.29%,一半进入非精英职位,而三类非大学生群体主要从事非精英职业。

三是收入。收入均值最高的是农转非大学生(61009 元),其次是城市大学生(56616 元),未转非大学生的收入均值是 43061 元。在三个非大学生群体中,收入均值最高的农转非劳动力,为 26715 元,进城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最低(20236 元)。

在三个控制变量方面,六大群体的差异也是显著的。第一,无论是哪种群体都是男性多于女性。第二,非大学生群体的年龄平均值都要高于大学生群体的年龄平均值,未转非大学生的平均年龄最小,主要因为 2002 年以后不再强迫大中专新生迁移户口。第三,家庭背景处于优势地位的是城市大学生,处于最底层的则是进城农民工。

统计模型。对于就业机会的分析,我们采用多类别回归模型(MultinomialLogit)。对于经济收入的分析,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

三、模型分析结果

(一) 就学机会和农转非机会分析

接受高等教育和经历农转非是本文分析框架中两个重要的事件,已有的研究表明,先赋性因素将影响这两个事件的发生^{[26][27]}。考察两个事件的影响要素是我们模型分析的开端,分析结果见表 2、表 3。

表 2 显示,获得大学教育经历的机率,城市是农村的 2.92 倍($\exp(1.07)$)。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年龄差别显著,青年人的机会较高。同时,家庭背景越好,越容易上大学:家庭经济地位每增加一个单位,上大学

表 2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出生地(农村=0)	1.07***	0.078
性别(女性=0)	0.05	0.077
年龄	-0.06***	0.004
14 岁家庭经济地位	0.13***	0.197
常数项	0.38**	0.178
样本量	3916	
似然比卡方	495.41***	
Pseudo R 平方	0.11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表 3 是否经历农转非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教育(非大学=0)	2.84***	0.142
性别(女性=0)	-0.37***	0.1
年龄	0.04***	0.005
14 岁家庭经济地位	0.12***	0.026
常数项	-2.57***	0.239
样本量	2484	
似然比卡方	624.33***	
Pseudo R 平方	0.18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的机率就增加 14% ($\exp(0.13) - 1$)。表 3 显示,接受高等教育大大提高农转非的机率,差距是 17.12 倍 ($\exp(2.84)$)。家庭背景也提升农转非的机率:家庭经济地位每增加一个单位,农转非机率增加 13% ($\exp(0.12) - 1$)。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模型中。

(二) 六大群体的单位类型差异分析

表 4 结果帮助我们回答六大群体在单位类型上的差异性。模型 1、3、5 直接比较六大群体的差异,模型 2、4、6 加入了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三个控制变量,所有模型的参照组都是集体企业。模型 1、模型 2 显示,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进入党政机关的机会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未转非大学生的进入难度大于城市大学生,最难进入的则是进城农民工。模型 3、模型 4 显示,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进入国有企业的机会没有显著差异,未转非大学生的进入难度大于城市大学生,最难的是进城农民工。模型 5、模型 6 显示,进城农民工进入私营企业的可能性最高,其他五类群体之间没有差异。

表4 影响单位类型获得的多类别回归模型结果

自变量	机关 VS 集体		国企 VS 集体		私企 VS 集体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身份类别(城市大学生为参照)						
农转非大学生	0.29	0.31	-0.006	-0.05	-0.33	-0.38
未转非大学生	-1.17*	-1.15*	-1.62***	-1.72***	0.04	-0.21
一般城市劳动力	-0.94***	-0.97***	-0.55**	-0.46*	0.32	0.69***
农转非劳动力	-0.95***	-0.92***	-0.99	-0.91***	0.36	0.66***
进城农民工	-2.18***	-2.15***	-1.58***	-1.56***	1.07***	1.26***
性别(女性=0)		0.43**		0.27*		0.18
年龄		0.004		-0.02**		-0.05***
14岁家庭经济地位		0.06		-0.01		-0.03
常数项	0.48**	-0.21	1.94***	2.45***	1.75***	3.59***
样本量	3618	3618	3618	3618	3618	3618
似然比卡方值	792.64***	908.66***	792.64***	908.66***	792.64***	908.66***
Pseudo R 平方	0.11	0.13	0.11	0.13	0.11	0.13

为节省空间 标准误差未显示。统计显著水平: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三) 六大群体的职业地位差异分析

表5 展示的是六大群体的职业地位差异。模型1、3做直接比较,模型2、4加入了控制变量,参照组都是非精英职业。加入控制变量后,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变化,所以我们集中讨论模型2、4的结果。模型2表明,农转非大学生从事管理精英职业的机率是城市大学生的1.38倍($\exp(0.32)$),统计显著;未转非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没有显著性差异;进城农民工的进入可能性最低,比城市大学生下降了86%($1 - \exp(-1.95)$)。模型4表明,农转非大学生从事专业精英职业的机率是城市大学生的1.82倍($\exp(0.6)$),统计显著;未转非大学生的机率下降了62%($1 - \exp(-0.97)$);三个非大学生群体进入专业精英的机率很低,农民工最低。

(四) 六大群体的经济收入差异分析

表6 报告的是六大群体在经济收入上的差异。模型1直接比较六大群体的收入差异,以后各模型不断增加控制变量,以协助估计群体之间的净差异。模型1的决定系数为7%,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未转非大学生的收入低于城市大学生,非大学生群体的收入都低于大学生群体,收入最低的是进城农民工。模型2、3、4表明,在模型1发现的群体收入顺序依然存在。模型4显示,精英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非精英职业,其中管理精英的收入比非精英高出84%($\exp(0.61) - 1$),专业精英收入高出40%($\exp(0.34) - 1$)。

表5 影响职业类别获得的多类别回归模型结果

自变量	管理精英 VS 非精英		专业精英 VS 非精英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身份类别(城市大学生为参照)				
农转非大学生	0.28	0.32*	0.52***	0.6***
未转非大学生	-0.17	-0.03	-1.08***	-0.97***
一般城市劳动力	-1.61***	-1.71***	-2.28***	-2.31***
农转非劳动力	-1.33***	-1.33***	-2.38***	-2.38***
进城农民工	-1.99***	-1.95***	-3.24***	-3.16***
性别(女性=0)		0.46***		-0.11
年龄		0.02***		0.01**
14岁家庭经济地位		0.11***		0.07***
常数项	-0.42***	-1.69***	0.33***	-0.35
样本量	3916	3916	3916	3916
似然比卡方值	1131.22***	1182.66***	1131.22***	1182.66***
Pseudo R 平方	0.17	0.18	0.17	0.18

为节省空间 标准误差未显示。统计显著水平: * p < 0.1, ** p < 0.05, *** p < 0.01。

表6 收入差异的 OLS 回归模型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身份类别(城市大学生为参照)				
农转非大学生	0.06	0.04	0.02	-0.002
未转非大学生	-0.79***	-0.61***	-0.62***	-0.59***
一般城市劳动力	-0.84***	-0.88***	-0.86***	-0.68***
农转非劳动力	-0.95***	-0.93***	-0.89***	-0.73***
进城农民工	-0.99***	-0.96***	-0.88***	-0.67***
性别(女性=0)		0.612***	0.58***	0.56***
年龄		0.14***	0.13***	0.124***
年龄平方		-0.002***	-0.002***	-0.001***
14岁家庭经济地位		0.08***	0.09***	0.08***
单位类型(集体企业为参照)				
党政机关			-0.005	-0.02
国有企业			0.15	0.17
私营企业			-0.01	0.02
职业类别(非精英为参照)				
管理精英				0.61***
专业精英				0.34***
常数项	10.34***	6.98***	7.00***	6.89***
样本量	3 916	3 916	3 618	3 618
调整后的 R 平方	0.07	0.11	0.12	0.13

为节省空间 标准误差未显示。统计显著水平: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四、结论

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最根本的还是改善流动人口的职业生涯机遇,缩小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别。本文提出的当前城市劳动力六大群体的划分,为分析户籍制度和高等教育对的职业生机遇所产生的影响,既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视角,同时具有很强的操作化应用价值和政策意义。

CGSS2010 数据分析提供了三项重要的实证发现。第一,农转非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拥有相同的机会进入到党政机关和国家企业,也能够获得相同的经济收

入,也有相同的机会从事精英职业,甚至农转非大学生从事专业精英的机会要高于城市大学生。第二,获得了大学文凭,但是没有实现农转非的群体,其农村户籍的身份将会降低其职业生涯的机遇,他们在进入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从事精英职业、获得高收入等方面都会低于城市大学生。第三,在非大学生群体内部,经历农转非也将会提高农村背景劳动力的职业生涯机遇,农转非劳动力在上述的就业机会中都优于进城农民工。

通过实证结果得出,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着变迁和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获取资源和就业机会,但是户籍制度塑造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或许也是社会上要求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的原因。国务院 2014 年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虽然户口一元化的制度改革不一定解决城乡不平等问题,但至少为此社会目标提供了可能性。或许有人担心,户籍一元化之后,大量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将导致城市人口膨胀,产生连锁性的制度配套和资源短缺问题。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必须置于确实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

[参 考 文 献]

- [1]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1): 149-162.
- [2] Wang FL. Renovating the Great Floodgate: The Reform on China's Hukou System. Martin King Whyte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 - 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5-364.
- [3]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50.
- [4] Wu XG, Donald J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J]. Demography, 2004, 41(2): 363-384.
- [5] Solinger DJ.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Knight J, Song L, Huaibin J. Chinese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Enterprises: Three Perspectives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5(3): 73-104.
- [7] 蔡昉, 鄱阳, 王美艳.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 经

- 济研究 2001(12):41-49.
- [8] 谢桂华.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J]. 社会学研究 2007(5):84-110.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EB/OL]. 2012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 [10] Becker, G.S. Investment in Human - Capital: a Theoretical -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9-49.
- [11] 李培林, 李炜.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 社会学研究 2007(3):1-17.
- [12] 邢春冰.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J]. 管理世界, 2008(5):55-64.
- [13] Démurger S, Gurgand M, Li S et al. Migrants as Second - class Workers in Urban China?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37):610-628.
- [14] Meng X, Zhang JS. The Two - 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29):485-504.
- [15] 王美艳. 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 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 [J]. 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 2003(5):94-98.
- [16] Oaxaca R. Male - 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3):693-709.
- [17] 谢桂华.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J]. 社会学研究, 2007(5):84-110.
- [18] 邓曲恒. 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 - 基于 Oaxaca - Blinder 和 Quantile 方法的分解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2):8-16.
- [19] Fan, C.C. The Elite, the Natives, and the Outsiders: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J].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92):103-124.
- [20]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J]. 社会学研究 2007(6):38-65.
- [21] Wu, X.G., Donald, J.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 - 1996 [J]. Demography 2004, 41(2):363-384.
- [22] Ganzeboom, De Graaf & Treiman.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 - 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2(21):1-56.
- [23] 谢桂华. “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4(1):40-56.
- [24] 吴晓刚. 1993 - 2000 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J]. 社会学研究 2008(6):33-57.
- [25]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 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J]. 社会学研究 2010(3):82-113.
- [26]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 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J]. 社会学研究 2010(3):82-113.
- [27] 边燕杰, 李颖晖. 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 “农转非” 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124-134.

(责任编辑: 司国安)

The Rural - Born College Educated and Their Career Chances:

Findings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BIAN Yanjie, XIAO Yang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haanxi 710049)

Abstract This paper classifies China's urban labor force into six categorie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the roles of birthplace hukou and college education in an individual's career chances. The analysis of CGSS2010 dataset shows that (1) when rural - born individuals gain both urban hukou and college education, they begin to enjoy an equal treatment in the attainment of workplace, occupation, and wage statuses as the college educated urbanites; (2) when a rural - to - urban hukou transfer does not occur, the rural - born college educated experience fewer chances in the status attainments as measured above than the college educated urbanites; (3) among the less - than - college educated, hukou transfer makes the same effects on rural - born workers as compared to the urbanites with the equal attributes. This paper creatively develops the six - category scheme in urban China, and has guid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clear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search, differentiate the roles of birthplace hukou transfer and college education in occupational and income attainments.

Key words birthplace hukou sector occupation income